

枷锁中的文学

——我对现代中国文学范畴内唯美与功利关系的思考

李子豪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3190110098)

摘要:唯美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颇受争论,历史上许多美学家与哲学家也都对此进行过大量研究。本文是2021年春学期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一篇课程论文,主要探究在现代中国文学范畴内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不同思潮对唯美与功利问题的一部分看法,并总结规律与启示。

关键词:美;功利;现代中国文学;文学自由论;文学功用论;工具论

前言(选题来源):一学期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结束,我对从文学改良开始至延安文学阶段的文学史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思考期末论文选题时甚是纠结:梁启超吗?文言文不想读写。草创或成熟期白话诗歌或散文?它们的内涵和解释可太多了。鲁迅老舍张爱玲写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也已经在准备展示时研究过了。话剧不知从何下笔,延安文学容易写成毛概。京派的田园牧歌或海派的奇思妙想我倒想写的,但是我又总想在写文学同时写点文学之外的东西。这“文学之外的东西”我相比于同辈稍稍能把握的恐怕只有哲学或美学,因为我曾选修过早期现代哲学,对康德有着一点粗浅的了解。搜集论文资料的时候,我也是从老舍搜到沈从文,从沈从文搜到文学自由论,又从文学自由论搜到唯美与功利的关系问题。至此我的选题便定了:相比于挑那么一两个作家,或写其笔法,或写其思想,我更愿意尝试以唯美与功利的关系为线索串联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我也很清楚,深入研究文学领域的任何问题几乎都可以写出本书来,因为文学跟历史、哲学、社会、心理等众多学科有着太多的交集。我这篇课程论文如果能够以非中文系学生的视角对现代中国文学范畴内唯美与功利关系稍加研究,有点创新的发现,便足够了。

康德在三大批判之一《判断力批判》中断言:“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¹这种美学观念到了文学艺术领域,便成为了我们熟知的“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唯美主义观念。康德有关艺术本身无功利性的定律颠覆了其之前的传统美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艺术神圣化”的时代,是一个“审美超越并相对独立于功利基础的经典艺术阶段”²。随着时代发展,康德想象中的“纯粹艺术”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维持,至少在文学层面没有得到很好地维持——文学成为过反抗封建压迫与反抗资本剥削、传播政治思想的工具,在商品经济盛行之时也难以避免地经历了商业化,掺杂了商业因素。

在现代中国文学范畴内,由于社会局势的复杂多变,将文学作为工具企望改造社会之人不在少数,比如梁启超和部分文学研究会成员、部分延安文艺作家,但同样也有作家强调文学艺术的本位,反对功利的创作动机,比如早期创造社部分成员、坚持“文学自由论”的沈从文、朱光潜等³。

一 现代中国文学之初——文学改良阶段

在进入现代中国文学阶段之前,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传袭的文学观往往都是功利的,即“文以载道”。儒家哲学,甚至是整个中国哲学相较于西方都是重实用的,儒家文学观念也看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⁴对于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王国维曾经批判说“观近数百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王国维是从叔本华走向康德的,积极引进了“审美无利害性”的命题,但是并不足以对抗当时时局驱使下的文学功利化。王国维生于洋务时期,逝于北伐时期,整个生平年代都动荡不安——清朝的国门被列强打开后,资本无止境地流入中国,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双重镇压。恩格斯所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

¹ 《判断力批判》,伊曼努尔·康德

² 李艳. (2011). 审美与功利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244-246. p244

³ 吴中杰. (1996). 京派、海派与文学上的中间路线[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34-41. p40

⁴ 黄开发. (2005). 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5), 119-123. p119

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⁵”，那么在晚清时期文学的功利性必然是要大于审美性的。

进化论对晚清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康德美学。因为纯文学并不能像“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那样迅速富国强民，纯文学在晚清本就落魄。⁶梁启超在进行文学革命时非常重视文学对社会的作用。笔者认为，梁启超在小说被轻视的时代之所以会选择进行小说界改革，扭转小说的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其对小说的教育、社会功能的认识，而不单是美学价值。他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写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⁷”。他认为“熏”、“浸”、“刺”、“提”四大力能够“支配人道”、“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这表明了其进行小说界改革的初衷，尽管对小说对社会的作用有着夸大成分。在课程阅读材料《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那么，除了个别优秀的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⁸。随后作者又指出这种深度“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层次上的检视”。在叔本华的美学体系中“美”与“人生”有着紧密联系，那么笔者认为“深度停留在政治，不向人性前进”正是对文学改良阶段的一个很好总结——总体而言文学的功利性远大于了审美性。

二 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研究会、早期创造社阶段

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文化，坚决反对儒家“文以载道”的说辞。但是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这种“文以载道”是载封建之“道”，而并不反对“文以载道”，即把文学用作工具解决思想、政治问题这一观念本身。⁹笔者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纯文学的发展，但是主流的对于审美与功利的观念依然是工具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核心是“人”，比较知名的启蒙观念有易卜生的写实主义与周作人的人道主义，然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功利的。课程阅读材料胡适《易卜生主义》中，胡适评论道：“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的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¹⁰易卜生写实主义的功利性便可见一斑。后期的周作人是认同“独立的美”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他都梦想通过文学来倡导人道主义精神，塑造新的国民性格，建立起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国度，此时他将文学当作一种武器使用，毫不讳言文学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功利性。¹¹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新青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在文艺内容上强调文艺为现实服务、在文艺形式上倡导白话实则是将文字作为一种工具¹²。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文学研究会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¹³。就此笔者认为，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总体上依旧是功利的，但是这种功利并不体现于政治主张，而更多的是解决人生思辨问题。冰心看到了五四落潮新青年们信仰丧失，由乐观救世逐步转向悲观厌世，才有了《超人》中被感化的何彬；许地山看到了封建婚姻的罪恶，才有了《命命鸟》中敏明和加陵走向极乐世界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文学研究会积极探索现实和人生的问题，他们的笔法往往是塑造一个特定的故事情境来揭示问题，而不是通过论战来改变局势。尽管文学研究会对待文学是功利，他们的精华作品依然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超人》的诗化小说风格、《命命鸟》对光这一意象的运用都让人读来流连忘返。

同时期的另一个阵营，创造社，对待文艺的态度与文学研究会迥然不同。早期的创造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是一种浪漫主义，是自身情感的抒发，而不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而兴起的思绪。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承认“天才”，因为只有天才自身的情感能够通过笔法凝结成真正的美。我们读《沉沦》

⁵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⁶ 黄勇生。(2011)。进化论思想与晚清文学革命中的功利主义文学观[J]。贵州社会科学，2011(4)，93-97. p93

⁷ 《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

⁸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⁹ 黄开发。(2005)。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119-123. p123

¹⁰ 《易卜生主义》，胡适

¹¹ 郑莉。(2013)。独立美与无形功利——论周作人20年代个性的文学观[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3)，116-120. p116

¹² 郭焕苓。(2015)。浅谈《新青年》杂志中的文艺审美功利观[J]。青年文学家，(33)，26-26. p26

¹³ “文学研究会”辞条，百度百科

时陶醉于郁达夫通过华丽细致的景物描写所渲染的意境，感情也被郁达夫牵着走向苦闷；读《迟桂花》时陶醉于翁家山缓和淡雅的风光和翁莲的天真；读《梅玲之春》时又感到一种郁闷、压迫，好像读着读着就喘不过气来……这些文本带给我们的，都是比之前纯粹的多的美的体验。但是早期的创造社终是摆脱不了现实的动荡，笔法上也只是蒙了一层浪漫主义面纱，并没有走向纯粹的唯美主义——《沉沦》流露着作者对国富民强的渴望，《迟桂花》流露着作者对美好的向往，《梅玲之春》最后的结局好像也透露着一些现实的东西。换个角度思考，任何文本的作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对现实、对国民的感觉，那么真正的“丝毫没有功利观念”又怎么可能实现呢？如果非要完全调和唯美与功利之间的关系，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¹⁴这一悖论又怎么回避呢？至少在当今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回避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创造社对唯美与功利关系的调和做出的贡献已经很卓著了。

三 左翼文学、新感觉派、京派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之多、主义之杂、思潮之众是文学分化的表现。

左翼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启蒙、救亡、解放。左翼文学从起点上就没有将发展文学性或艺术创新作为最终追求。在急功近利的前提下艺术追求本身就不一定可能实现¹⁵，因此即使左翼作家清楚文学性的重要，他们在文本上流露出的最终目的往往是政治化的。

笔者认为，就审美与功利的关系而言，同时期的新感觉派、京派二者与政治主导的左翼文学迥然不同。在当时，京派和海派是相对立的文学派别。京派反对海派突出的商品文化，反对其广告性、投机性。新感觉派虽属于海派的一部分，但是与京派就文学的主体性这一问题上达成了统一。这两派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创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¹⁶。

新感觉派没有太多的政治诉求，而坚守着一种有唯美主义成分的现代主义¹⁷。我国新感觉派作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川端康成、横光利一、谷崎润一郎等日本“新倾向”作家的影响，体现出一条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明晰线索¹⁸。唯美主义一头连着浪漫主义，另一头连着现代主义，因此新感觉派与创造社有着很大的相似成分，只不过新感觉派作家往往用更奇妙的手法来抒发内心感受。课程阅读材料中，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通过镜头快速切换刻画了一种藏在对比之中的震撼美，描绘出了一个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在《白金的女体塑像》中又用蒙太奇手法反映出都市带给人们的情感缺失；施蛰存在《梅雨之夕》中利用心理分析方法刻画了一种朦胧的美，传达了都市带给人们的情感压抑。

京派作家们追求静穆的意境，有意超越阶级斗争和商品经济。与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路线不同，京派作家是贯彻自然主义路线的。废名专写生活琐碎事和田园小说，在他笔下看不到生活的激流，看不到时代的脉搏；沈从文直到抗日胜利后还坚持文学自由论，希望政治不要干涉文学。在他的代表作《边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政治色彩，而能看到的只是流淌在全文中的自然美。当然即使是沈从文这种“无功利的美”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其《八骏图》通过刻画知识分子群像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虚伪性，也是具有着一定的功利性的。

京派与新感觉派也是有分歧的，比如新感觉派对于欲望的表现是显性的，可能有着一定的商业因素影响；而京派对于欲望的表现是隐性的¹⁹。这中分歧大概是出于现代主义和自然主义二者背后哲学的分歧。但是人们往往忽略掉的是二者在文学本位观念上的一致。

¹⁴ 黄开发. (2004). 唯美与功利的调和——早期创造社的文学功用观[J]. Hainan Shi Yuan Xue Bao, 17(5), 13-18. p15

¹⁵ 李时学. (2013). 中国左翼文学论争的悖论与澄明[J].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6(3), 93-100. p98

¹⁶ 刘川鄂. (1999).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综论[J]. Jiang Han Lun Tan = Jianghan Luntan, (3), 64-68. p64

¹⁷ “新感觉派”辞条, 百度百科

¹⁸ 张艳. (2013). 新感觉派小说研究[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1), 83-87. p83

¹⁹ 陈广通. (2018). 沈从文与新感觉派的欲望书写[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34(1), 94-100. p96

四 抗战时期的延安文学阶段

抗日战争开始后,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左翼作家、海派作家、京派作家空前团结,形成了统一的文艺战线。出于时局的影响,不论作家本身是否认为文学应当相对独立、审美应该超越功利,民族危亡的紧张局势都不允许作家宁静地在书房中画梦雕龙,文学也往往被各个作家用作同帝国主义抗争的工具。随后的延安文学几乎就是建立在功利之上的。延安文学歌颂光明、歌颂乐观、歌颂工农兵,也反思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丁玲《在医院中》),是本身受了极大政治影响而发展出的文学——正如毛泽东的指示,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是“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²⁰

随后的国共斗争时期超出了课程所涉及的范围,但是我在搜集资料时看到了非常具有启发式的观点:想要唯美脱离功利、文学脱离政治,势必要在政治上选择一条“中间路线”,而当时国共双方矛盾尖锐,两党都要调动一切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因而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文学自由论”就非常不合时宜。1948年,郭沫若将中间派自由主义文艺工作者直接斥为“反动文艺”,用“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的二分法理论对中间派进行了批判。²¹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出于现实的考虑,在这一时期文艺想要超越功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 总结、规律发现及启示

笔者认为,总的来看,整个现代中国文学范畴内文学的功利性相较于审美性占据了主体地位,尤其是在时局最为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以及抗战时期。就此笔者认为,当政治局势出现波动时,文学往往会作为工具站出来挽救危亡;而当政治局势较为缓和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才可能充分展现。

文学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文学本身就不是独立的,它和历史、政治、社会本就是息息相关的。而文学的主体,作家本身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因此绝对的文学“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笔者并不是文史哲专业的研究人员,出于个人能力限制并没能思考出一个完整、合理的方案来解决审美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但是也可以就个人经验和学识对审美与功利问题的一个子问题——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提出一点拙见。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政府的存在意义是利用集权与其他阶级相抗争。也就是说,政府在马克思眼中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完成后政府会自动“消亡”,只执行简单的管理职能²²。到了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阶段,阶级不复存在,斗争也就不复存在,文学所背负的斗争工具重担也就可以被卸下。然而在之前以及目前的社会阶段,想要文学完全自由是不现实的。在到达理想社会之前,政府的存在需要文学的辅助与维持,因此文学工作者在探索文学性的同时应当随时能够响应国家的号召,完成带有功利性色彩的文学作品——用于宣传也好,用于斗争也好。

但是这有一个要求:政府的领导层必须清醒时局并作出对文艺工作者的正确指令。上世纪80年代前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的需要,我国文学被“过度政治化”,随后在90年代进行了“去政治化”,21世纪以来又出现了“文学再政治化”的呼声²³。在西方社会,从政治角度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与从文学角度要求文学的相对独立两种观点论争不断,其背后蕴藏的应当是深奥的哲学和美学问题。笔者期待有能力、有兴趣的学者对此进行进一步探索。

²⁰ 吴晓云. (2008). 论延安文学的特征[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3(7), 19-21. p21

²¹ 吴中杰. (1996). 京派、海派与文学上的中间路线[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34-41. p41

²²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马克思

²³ 赵惠霞. (2014).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美学解读[J]. Jiangsu Shi Fan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40(4), 23-27. p23

参考文献:

- [1]《判断力批判》，伊曼努尔·康德
- [2]李艳. (2011). 审美与功利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44-246.
- [3][21]吴中杰. (1996). 京派、海派与文学上的中间路线[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34-41.
- [4][9]黄开发. (2005). 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119-123.
- [5]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黄勇生. (2011). 进化论思想与晚清文学革命中的功利主义文学观[J]. 贵州社会科学，2011(4)，93-97.
- [7]《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
- [8]《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 [10]《易卜生主义》，胡适
- [11]郑莉. (2013). 独立美与无形功利——论周作人20年代个性的文学观[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3)，116-120.
- [12]郭焕苓. (2015). 浅谈《新青年》杂志中的文艺审美功利观[J]. 青年文学家，(33)，26-26.
- [13]“文学研究会”辞条，百度百科
- [14]黄开发. (2004). 唯美与功利的调和—早期创造社的文学功用观[J]. Hainan Shi Yuan Xue Bao, 17(5), 13-18. p15
- [15]李时学. (2013). 中国左翼文学论争的悖论与澄明[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3)，93-100.
- [16]刘川鄂. (1999).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综论[J]. Jiang Han Lun Tan = Jiangnan Luntan, (3)，64-68.
- [17]“新感觉派”辞条，百度百科
- [18]张艳. (2013). 新感觉派小说研究[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1)，83-87.
- [19]陈广通. (2018). 沈从文与新感觉派的欲望书写[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34(1)，94-100.
- [20]吴晓云. (2008). 论延安文学的特征[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3(7)，19-21.
- [22]《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
- [23]赵惠霞. (2014).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美学解读[J]. Jiangsu Shi Fan Da Xue Xue Bao. Zhe Xue She Hui Ke Xue Ban, 40(4)，23-27.